

《中国考古学年鉴》的 编纂模式、特点与影响

秦存誉*

摘要 《中国考古学年鉴》是记录我国最新考古发现、汇编最新研究成果和学科动态的年鉴性工具书。通过对 36 部《中国考古学年鉴》的分析,可知其主要设有 9 个栏目,编纂模式是中国考古学界最高级别的学术团体宏观指导,最高级别的科研机构具体实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考古机构和考古院校积极配合,国内绝大多数考古学者共同参与。《中国考古学年鉴》在探索中国考古发展变化、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的出版不仅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科的发展、促进了考古学者视野的拓展和水平的提升,同时还对其他相关学科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 《中国考古学年鉴》 编纂模式 特点 影响

1926 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①被视为中国学者独立进行考古发掘的肇始,此后中国考古学逐步迈向国有化发展道路,至今已经走过近一百年的历程。其间,重要考古发现如襄汾陶寺、舞阳贾湖、西安半坡、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广汉三星堆等迅速引起国内外关注。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的增多,考古学界迫切需要一部能广泛收集最新考古资料和学科动态的年鉴性工具书,《中国考古学年鉴》即是在此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②

《中国考古学年鉴》由中国考古学会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撰写,文物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出版。自 1984 年首次出版以来,至今已经出版了 36 部,是及时反映最新考古发现、研究成果、学科发展动向及教学和学术活动的权威书籍。《中国考古学年鉴》的出版,为广大考古工作者和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了探索考古工作实践和学科发展水平的便利。本文拟对《中国考古学年鉴》的编纂情况进行梳理,通过宏

* 秦存誉,男,河南省封丘县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学史。

①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 年。

② 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372 页。

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尝试归纳《中国考古学年鉴》的编纂模式与特点,以期深化其在考古学发展上的历史地位和学科影响。

一、《中国考古学年鉴》的内容

目前出版的36部《中国考古学年鉴》在内容上主要由9个栏目组成,分别是考古学研究、考古文物新发现、赴外考古、学术会议、对外学术交流、考古教学、逝世考古学家、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大事记。

考古学研究。综述、评介年度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的栏目。按时代或专题,常设“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时期考古”“秦汉时期考古”“三国至隋唐五代时期考古”“辽宋金元明清时期考古”“甲骨文、金文研究概述”等板块,分别邀请相关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执笔,述评年度内发表的各种论文、学术论著和专题报告等。

考古文物新发现。报道年度考古发掘项目的栏目。以省份设立板块,大体按照时代顺序,由各发掘项目的领队或实际负责人执笔,简介年度内各发掘项目的发掘时间、负责单位、发掘概况、收获及学术意义等信息。

赴外考古。报道年度国内考古机构赴境外进行考古工作的栏目。按照时间顺序,由各项目的负责人执笔,简介年度内各项工作的开展时间、工作单位、工作概况、工作收获及学术意义等信息。

学术会议。汇编年度国内学术会议的栏目。按照时间顺序,由各会议的负责人执笔,介绍年度内各会议的时间、日程、参会人员、会议主题和主要讨论内容等信息。

对外学术交流。汇编年度国内学者出访和国外学者来访活动的栏目。以各文物考古单位为板块,按照时间顺序,由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执笔,介绍各活动的时间、参与人员、学术交流内容等信息。

考古教学。汇编年度高校考古学系相关教学活动的栏目。按本科、硕士、博士(含博士后)设立板块,按照高校顺序,由各高校的主要负责人执笔,介绍年度内各高校毕业的本科生人数和硕、博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指导老师、学位论文题目等信息。

逝世考古学家。缅怀年度逝世考古学者的栏目。一般由本年度逝世考古学者的学生执笔,介绍其生前的学术经历、主要观点和学术贡献等信息。

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汇编年度考古学文献资料的栏目。按类别设“考古学书目”“考古学论文资料索引”“新发表古代铭刻资料简目”等板块^①,介绍各书目的出版机构、编(著)者、主要内容,各论文的发表平台、著者、期别、页码,各铭刻的承载介质、时代、可识别的文字等信息。

大事记。记录年度考古重要事件的栏目。按照时间顺序,简介与中国考古相关的国内外考古事件的参与机构、人员及主要内容等信息。

^① 《中国考古学年鉴(2018—2019)》未见“考古学论文资料索引”板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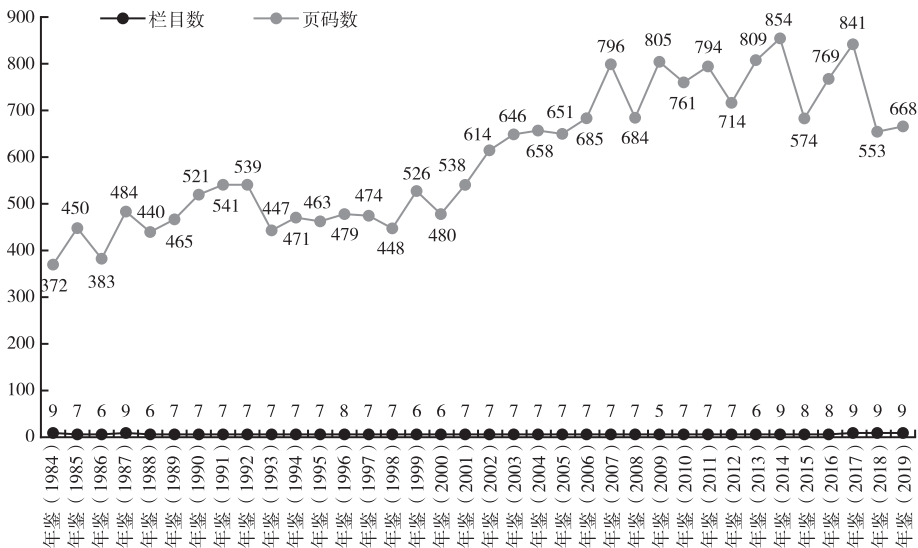


图1 历年《中国考古学年鉴》的栏目数及页码

注:2014—2019年卷开本较1984—2013年卷更大,如按此开本计算,页码均应在800页以上。

历年《中国考古学年鉴》的栏目数及页码变化如图1所示。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以上9个栏目在每一部《中国考古学年鉴》中并非均有出现,而是视具体年度的实际情况而设立。整体而言,出版时间越早的年鉴,栏目数及页码越少,各栏目设立的板块分类越简单,出版时间越晚的年鉴,栏目数及页码越多,各栏目设立的板块分类越复杂。这种变化与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逐年增多有关,表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速度与考古工作的推进程度密切相关。

二、《中国考古学年鉴》的编纂与出版模式

《中国考古学年鉴》由中国考古学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具体实施组稿、编辑等事宜,邀请考古学界一线发掘与研究人員撰写各个条目,以保证各栏目相关内容的权威性和前沿性。目前来看,历年《中国考古学年鉴》的主编基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在任所长担任,如1984—2007年卷由王仲殊、刘庆柱等担任主编,2008—2018年卷由王巍担任主编,这种安排可以最大限度地统筹考古学科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因而,《中国考古学年鉴》可以视为代表国内考古学界权威观点和理论导向的工具书。

《中国考古学年鉴》的命名采用“中国考古学年鉴”+“年份”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每部年鉴都是综述上一年度考古学研究、考古文物新发现、国内外学术动态、考古教学、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等信息,因而书名上的“年份”会比资料年份多1年,如《中国考古学年鉴(2018)》记录的是2017年的资料。《中国考古学年鉴》原则上每年出版1部,但因人力

难以干预的客观环境所限,并非都可以按时出版,如1986年、1987年、1993年、1996年、2019年均未出版,1988年、1997年、2002年则分别出版了两部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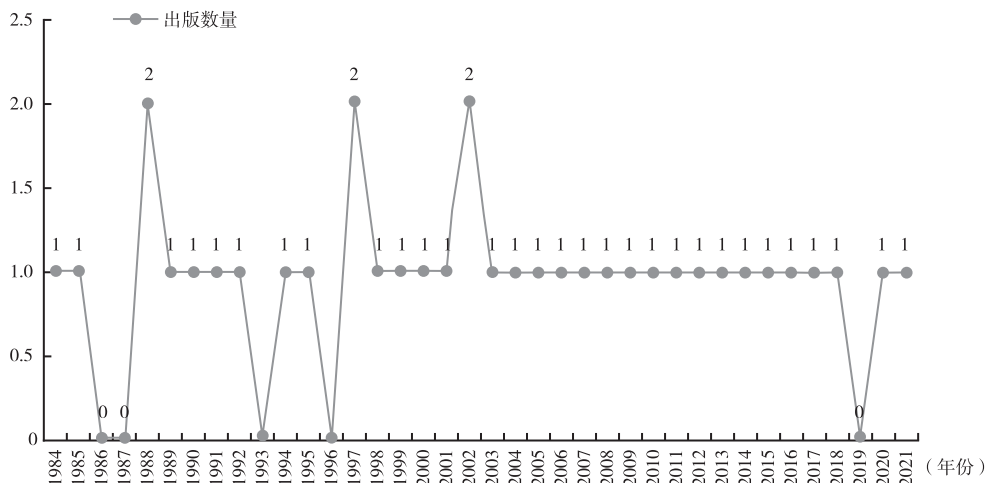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考古学年鉴》各年度出版数量

每部《中国考古学年鉴》从组稿、撰写到统编、定稿,再到出版发行,用时一般为两至三年。资料汇编栏目如“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等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部人员撰写,学科发展动态栏目如“学术会议”“对外学术交流”“考古教学”等多由相关活动的负责人撰写。“考古学研究”“考古文物新发现”是两个重要栏目,分别由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和考古项目的负责人撰写。撰写工作完成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汇总并送交出版社出版。从36部年鉴的出版周期来看,周期为1年的有2部,周期为2年的有22部,周期为3年的有11部,周期为4年的有1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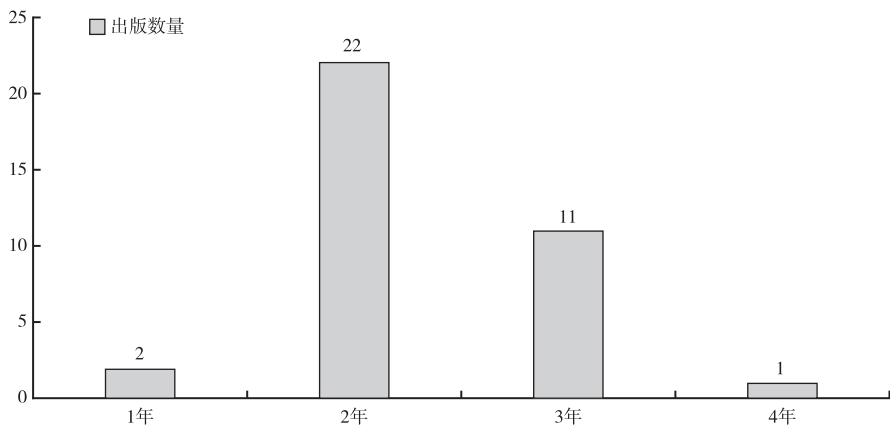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考古学年鉴》各周期出版数量

每部《中国考古学年鉴》均以单册形式出版,以方便查找、使用和携带。每部年鉴在封(底)面构图、体例编排上大体一致,表现出规划有序的协调性和一定程度的美观感。每部年鉴的开本也大体一致,但会根据各年度考古资料的多寡而调整。如《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的开本为“787×1092 1/32”,此后一直到2014年,每部年鉴的开本统一定为“850×1168 1/32”。从2015年开始,出版单位改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开本亦随之增大,变为“878×1092 1/16”。总之,每部年鉴的出版都充分考虑了读者需求、出版社标准和考古学科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

三、《中国考古学年鉴》的特点

《中国考古学年鉴》资料收录齐全,反映信息及时,文献功能完备,并且具有深厚的专业特色,促进了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它的持续出版也证明,这种由中国考古学界最高级别的学术团体(中国考古学会)指导和最高级别的科研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具体实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文物考古机构和高校考古学系积极配合的团结国内绝大多数考古从业者的编纂模式是十分成功的。

《中国考古学年鉴》的特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进行考察。

宏观方面,《中国考古学年鉴》对每年考古学界的考古发现、研究成果、学术动态和教学活动等都进行了全面整理和记录,是考古学科的年度工作报告。利用目前出版的36部年鉴,不仅可以从纵向维度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历史进程,而且还可以从横向维度探索中国考古学各个方面(领域)的发展情况。

以“考古学研究”栏目为例,早年该栏目主要有断代考古,如“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等板块的述评。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新增加了许多专题考古,如增加“冶金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盐业考古”“数字考古”“音乐考古”等板块的概述。每年都有涉及的断代考古板块,21世纪以前关于“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述评主要涉及文化分期、年代、谱系、性质、互动关系、源流等方面的内容;21世纪以后,关于聚落形态、人地关系、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生计方式、社会生活、社会组织结构和性质等方面的内容大量涌现。

再以“考古教学”栏目为例,该栏目主要统计每年毕业的本科生人数、每年毕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其学位论文、每年出站的博士后及其出站报告等信息。依次翻阅历年年鉴可知,考古学科的毕业生数量明显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向,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也随着当年或近年考古发现的更新而变得多元化。这也不难理解,考古学专业的人数增多使得各省级、地市级文物考古机构和高校考古学系具备了承担更多、更大发掘项目的可能性,由此加快了全国考古工作的开展。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研究成果的丰富,无疑会引起国家文物局和教育系统对考古学的重视,这也是考古学科扩大招生规模的重要依据。

微观方面,《中国考古学年鉴》提供给读者的文献资源既有考古新发现、铭刻等首次披露的基础资料,也有研究书目、论文等二次文献资源,还有研究综述等三次文献资源,可以

满足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研究人员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使用需求。利用中国知网查找《中国考古学年鉴》的引用情况,可以检索出近 3000 篇期(辑)刊论文、1700 余篇学位论文和 100 余篇会议论文,如果加上中国知网未收录的考古学相关的会议论文集和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考古学专业的学位论文,这一数据肯定会更加庞大,《中国考古学年鉴》对考古学科学术研究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题名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	数据库	被引	下载	操作
□1 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宋艳波	山东大学	2012-04-15	博士	41	2636	↓ □ ☆ Ⓞ
□2 江南地区两周时期墓葬研究	付琳	吉林大学	2014-06-01	博士	17	2872	↓ □ ☆ Ⓞ
□3 中原地区公元前三千纪下半叶和公元前两千纪的聚落分布研究	Pauline SEBILLAUD (史宝琳)	吉林大学	2014-06-01	博士	24	3478	↓ □ ☆ Ⓞ
□4 中国沿海先秦贝丘遗址研究	赵琴	复旦大学	2014-04-01	博士	11	2465	↓ □ ☆ Ⓞ
□5 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早期青铜时代遗存研究	陈小三	吉林大学	2012-12-01	博士	59	4440	↓ □ ☆ Ⓞ
□6 隋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	石文嘉	南开大学	2014-05-01	博士	9	3662	↓ □ ☆ Ⓞ
□7 郑国与韩国墓葬制度比较研究	周剑	郑州大学	2014-05-01	硕士	9	742	↓ □ ☆ Ⓞ
□8 后李文化研究	孙启锐	山东大学	2014-05-29	硕士	21	1131	↓ □ ☆ Ⓞ
□9 秦汉水井空间分布与区域差异研究	尚群昌	郑州大学	2015-03-01	博士	10	1279	↓ □ ☆ Ⓞ
□10 中国北方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殉牲研究	包耀光	吉林大学	2014-06-01	博士	28	2567	↓ □ ☆ Ⓞ

图4 《中国考古学年鉴》的引用情况

“考古学研究”和“考古文物新发现”两个栏目,前者是由知名度较高的专家学者对相关领域主流观点的高度梗概,后者是由一线考古工作人员对相关考古发现的及时报道,这两个栏目在引导考古学科稳步发展和弥补研究资料不足方面具有强烈的互补作用,对相关学科领域初学者的导向性和瓶颈期学者思维的延展性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以《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1991年卷中的“考古文物新发现”为例,1990年报道的邓州陈营、南阳叶胡桥和1991年报道的济源庙街遗址的发掘材料至今仍未发表,这三篇报道也就成了研究河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文化难以回避的文献资源了。

“学术会议”和“对外学术交流”两个栏目,详细记录了每一年考古学界的重要学术会议和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的日程、内容纪要等信息,对相关研究人员把握学术前沿热点具有重要价值。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时期,学者们了解学科动态往往需要亲自前往活动所在地,但即便这样,也不可能兼及所有,甚至有些活动很多年以后方才知晓。《中国考古学年鉴》的出版就及时解决了这一问题,有了这套记录详实的年鉴资料,学者们无论是想快速浏览年度学科发展动态,还是想针对某一活动进行深入了解,都有了可供查找的信息来源,这对拓展相关学者的研究思路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

四、《中国考古学年鉴》的历史地位和学科影响

《中国考古学年鉴》是历年田野发掘资料、研究成果、学术活动和学科发展动态的概括和总结,是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缩影,对推动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具有重要价值。^① 历年《中国考古学年鉴》中的“赴外考古”“对外学术交流”栏目,收集了中国与国外学术交流的各种活动。中国考古队近年来的赴外考古工作,展示了中国有能力走出去,站在全球视野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大国风范,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文化与科学景观,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强起来”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文明象征,也是中国考古学人文化自觉和自信的具体体现。^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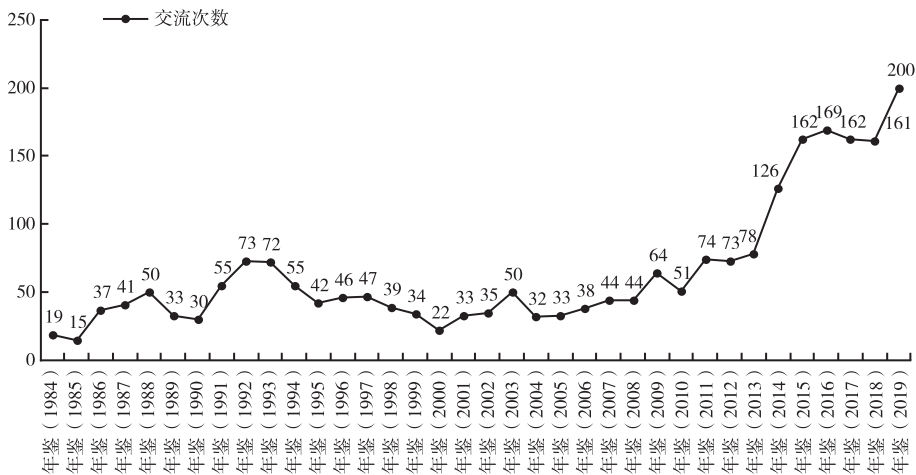


图5 历年《中国考古学年鉴》收录的“对外学术交流”次数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与国外每年的学术交流活动仅有几十次,21世纪以后,交流次数直线攀升,达到百余次。尤其是近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国高校考古学系、各省市级文物考古单位均有能力组织一定规模的对外交流活动,除了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次数大幅提升外,还将中国的重要考古项目和优秀学者推介到国外,极大提升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收录于历年《中国考古学年鉴》中的对外学术交流内容,见证了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中的地位变化。可以说,《中国考古学年鉴》在了解中国考古发展变化、促进对外学术交流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考古学年鉴》的学科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动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考古学年鉴》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编纂,撰写人员均是具有一定水平并活跃于学术界的研究者,

① 李健民:《对〈中国考古学年鉴〉特色的几点认识》,《年鉴信息与研究》2000年第1期;张广荣:《〈中国考古学年鉴〉的特色及其在考古学科发展中的作用》,《东南文化》2000年第11期。

② 贺云翱:《“中国考古走出去”开启历史新篇章》,《大众考古》2018年第1期。

能够切实把握考古学发展的脉搏。从历年年鉴的编纂及其与考古学科发展的关系来看,《中国考古学年鉴》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相关研究人员审视中国考古工作实践与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可以说,每一部年鉴的撰写都是在上一部基础上的更新和完善,这种更新和完善不仅提升了《中国考古学年鉴》的编纂质量,同时也推动了考古学科的持续发展。

第二,研究中国考古学史的重要资料。目前,考古学界关于中国考古学史的研究主要有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①、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②、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③、沈颂金《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④等专著和考古期刊散见的论文。因学者研究方向不同,这些论著各有侧重,如陈星灿偏重史前时期,卫聚贤、阎文儒偏重历史时期,这些论著无法全面概括中国考古学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中国考古学年鉴》的编纂集结了考古各领域的研究者,是考古学界的“百科全书”,以之为基础来研究中国考古学史,可以更加全面和系统。

第三,促进考古学者拓展视野的辅助工具。《中国考古学年鉴》为考古工作者和研究者提供的信息资源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如“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和“考古文物新发现”可以分别为研究人员和发掘人员提供服务,“考古教学”可以为高校考古学系师生提供借鉴等。另外,《中国考古学年鉴》作为一部内容庞杂的资料库,并非简单的罗列文献,它还具有一定的检索功能。利用中国知网的“年鉴导航”找到“中国考古学年鉴”,在搜索框内输入关键词如“条目题名”“作者”等,可以快速查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源,极大提升了研究者获取资源的效率。

如果说《中国考古学年鉴》对考古学各领域学者的研究具有促进作用,那么各领域学者研究水平的提升和对相关问题认识的深入,一定也可以促进《中国考古学年鉴》编纂质量的提高,包括材料收集更加广泛,内容撰写更加凝练,体例编排更加合理,等等。当然,《中国考古学年鉴》质量的提高和内容的丰富,除了可以吸引更多的受众外,还能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增添助力。总之,《中国考古学年鉴》的编纂与考古学科的发展是一种良性互动,是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具有点睛作用的经典工具书。

除了对考古学科有影响外,《中国考古学年鉴》还对其他学科产生了一些影响。历年年鉴的“新发表古代铭刻资料简目”“甲骨文、金文研究”“简牍、帛书研究”“音乐考古”“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等栏目,对历史学、天文学、古文字学、音乐学、美术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都有着启发和借鉴作用。以音乐学为例,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多孔骨笛,不仅是考古学者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诸多音乐学者关注的焦点,甚至许多音乐学专业的研究生都是以此来撰写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⑤再以金文、甲骨文研究为例,自1984年卷开

① 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

②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③ 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④ 沈颂金:《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学苑出版社,2003年。

⑤ 孙毅:《舞阳贾湖骨笛音响复原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夏季:《中国古代早期管乐器及黄钟律管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始,历年《中国考古学年鉴》都会发表大量经过权威学者释读后的金银器、墓志、碑刻、玺印等器物上面的文字信息,而这也是该书最稳定的一个编写栏目。这些资料不仅是考古学者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历史学(先秦史、隋唐五代史方向等)、文学(汉语言文学、古文字学方向等)、天文学等领域的专家所必需的。

五、余 论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通过深入学习历史,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中国考古学年鉴》作为全面、系统整理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工具书,汇编了中国考古学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示了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考古学年鉴》记录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就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素材,也是证明中华千年文明的重要实物支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说的那样:“要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对外宣传、交流研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①

责任编辑:冷晓玲 宿万涛

^① 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求是》2020年第23期。